

体认语言学研究专题导言

我国当下大力倡导“文史哲打通的新文科”科研理念,更加坚定了我们哲学与语言学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理念。我们曾于2014年在《外国语文》上发表了文章《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屈指一算,这篇文章发表已有十年,它在国内外学界引起诸多学者的密切关注,被引用了百余次。随后,我们在很多外语类期刊上组了30多组稿件,举办各种类型的讲习班50多场。我们还于2019年成立了“体认语言学专委会”,分别在川外、上外、广外、西外等高校举办了六届年会,每次参会人员达200多人。川外体认团队与国内外同仁还建立了“体认+”学科体系,如“体认语义学、体认语用学、英语体认语法学、汉语体认语法、体认构式语法、体认符号学、体认翻译学、体认口译学、体认修辞学、体认社会语言学、体认文化学、体认教育学、体认逻辑、体认诗学、体认地名学、体认教学法”等,形成了有我特色的研究思路,算是从“照着说、跟着说”走向“想着说、领着说”的一次尝试。

本期共收录四篇体认语言学研究论文。王铭玉教授等沿着体认符号学提出了“体认中性符号学”的大符号学概念,以消解语符与象符的二元对立,为研究符号学的普遍现象提供了一个新范式。黄建平教授在体认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考察了汉语“连”字的文化基因,文化特征及所负载的文化信息。曾国才教授将体认语言学与对话句法研究结合起来建构了体认对话句法学。我国著名教授胡壮麟和钱冠连两位先生奔走呼喊了很多年,直呼“真急人!”意在敦促语言学同仁们赶快将哲学和语言学紧密结合起来,进入学术前沿,引领世界学术发展潮流。我们真的盼望大家能在“新文科”这一响亮口号的震撼下,取奋进之态,行务实之本,不仅有方向,还要有措施,努力将语言学研究带入到后现代哲学新时期,为能实现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平视世界”“走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振兴中华民族”这一宏伟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王寅

体认中性符号学

——基于体认符号学与中性符号学的交叉研究

王铭玉¹ 康喆文²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410;2. 西安外国语大学 俄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中性符号学崇尚大符号概念,消解了语符号与象符号的二元对立,为研究符号学的普遍现象提供了新的范式。广

收稿日期:2024-04-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成就研究”(22AZD006)、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中央文献核心语汇多语种词典编纂和数据库开发”(KYD19027)和天津市教委2022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语言符号学的推广与应用”(2022-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铭玉,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华南符号学研究中心、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符号学、翻译符号学、体认符号学研究。

康喆文,男,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地理学、区域与国别研究。

引用格式:王铭玉,康喆文.体认中性符号学——基于体认符号学与中性符号学的交叉研究[J].外国语文,2025(1):12-21.

义的符号与主体感知、意义及生活世界相互交织,使得符号与认知产生深层次的关联。借鉴后现代体验人本观中“体认”的概念,本文尝试提出体认中性符号学这一新兴交叉方向,并从认知生态位、空间区域位、社会建构位、文化叙事位视角阐释中性符号学的体认性,旨在从深度上探索中性符号的本体特征,完善“语象合治”的中性符号学理论,并从广度上推动符号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融合,拓展东西对话、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互鉴的符号学模式。

关键词: 体认; 中性; 符号学; 语象合治; 交叉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5)01-0012-10

0 引言

符号学是一门源起于西方的现代显学。学界一般将符号学划分为理论模式的广义符号学和应用模式的学科符号学(Li, 2012: 229),由此揭示符号学元学科性、多学科性、跨学科性的特征。然而,西方学界以往关于符号实体与形式的二元对立分治似乎不能满足符号学元学科的属性。“语象合治”的中性符号学提出了“语符号”和“象符号”多重异质符号要素相互跨界、相互补充的观点(王铭玉等, 2021: 72),进一步推动了对于符号系统内部关联关系的探索。符号与符号主体、客观世界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本文基于体认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尝试探讨大符号观和认知科学视野下中性符号的体认性,阐释中性符号意指客观世界的外部动因,助推符号学向更为广阔、更为科学的道路迈进。

1 体认与符号学的融合变迁

提及体认与符号学的融合变迁不得不谈到认知符号学。认知符号学作为一个国际研究纽带,跨越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近30载的发展历程。认知符号学致力于发展一门“符号认知科学”,以便更好地探索符号与意义、心智之间的关系问题(Klinkenberg, 2014: 22)。在跨学科领域中,认知符号学试图在符号与认知之间架起不同学科的桥梁,被认为是人文社会学科及自然科学联系的当代符号学学科。通过将符号学理论及其应用与实验、模拟、调控等手段相结合,将认知的进化观点与批判性和解释方法进行对话,从而进一步阐明符号系统整体与“物化世界”“人化世界”的关联。故不少研究者认为,符号学与神经科学、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人工智能等认知科学相互依存、相互需要。

认知符号学的演进与认知科学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成为以认知心理学为代表的一代认知科学与语言学结合的关键标志,也成为后续认知语言学发展的开端。胡壮麟(2013: 6)将认知符号学的萌芽归纳为“认知语言学+皮尔斯符号学”,即两者均在主体经验主义和生物学的行为主义学说基础上,将人类思维原则引入语言符号及其他符号的意指过程。皮尔斯符号学思想对推动符号认知的贡献功不可没,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点:其一,基于符号的实体性与符号外部的相关要素,扩大了符号研究的范畴,象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的区分,为明晰符号的感官构成条件奠定了基础。其二,较早

地将符号学定义为“符号行动”,强调符号与使用者的行为习惯密切相关,并受个体经历与意志行为的影响,由此将“人”纳进符号研究的视野。其三,假设了符号的时空连续性,将符号视为时空连续统一体,并提出心灵与物质的联系,由此引出符号形态的演变及背后的心智因素。其四,区分了能动性和因果性,赋予符号创造性的范畴,即“第一性”(可能性)、“第二性”(现实性)和“第三性”(潜在性/必然性),把抽象符号与具象符号对应进一个因果流,体现出符号更高一层次的能动范畴(Azcárate, 2022: 229-245)。可以看出,皮尔斯关于符号学的“实用观”“被解释观”和“进化观”为认知符号学后续的发展打开了极为丰富的可能性。

20世纪70年代,认知科学开启第二代认知科学的革命,打破原先的“离身心智论”,以“心智的具身性”为主要标志,将认知看作是产生于生物体与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强调体验、情景与思维意识活动的相互作用及对意义建构的影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具身认知不断与脑科学、神经科学、生物科学等交叉融合,具身理论家主张一种更为全面的、具有相互关联特征的动态认知方法(8E),即用具身(embodied)、嵌入(embedded)、扮演(enacting)、延展(extended)、生态(ecological)、情感(emotional)、进化(evolutionary)、扩展适应(exaptative)等八个关键词来解释生物体认知内部与外部的关联协调(Pelkey, 2023: 7)。“具身”主要指生物体的感官知觉,以及由感知形成的记忆结构;“嵌入”指生物体长期处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下;“扮演”指生物体与其他个体在相互共享环境的过程中发生的互馈关系;“延展”指利用外部媒介作为认知交流的重要因素;“生态”强调了生物条件和物理条件是认知交流的基础;“情感”则提出依赖审美层面的理解进行意义建构;“进化”指出认知是在变异、差异和变化中保持稳定性和持续性;“扩展适应”指利用生物体的基本生理结构产生更为抽象和更为理性化的反思。结合符号学的物质性、意指性、社会性等特征,具身认知再次加深了对符号认知的理解:首先,揭示出符号系统内部要素的相互关联,将视觉、听觉、触觉等符号感官与符号意义创建主体的感性思维、理性思维、创造力等心智加工过程紧密联系,提出体验产生并赋予符号意义。其次,解释了符号系统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即符号作为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媒介,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逐渐识别生物体感知、行为、及环境之间的耦合,从而形成生物体与外界交流的动态机制。

认知科学的蜕变不断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影响着西方哲学观的变革。王寅等国内首批体认研究团队将不同时期的哲学人本观梳理为“零位人本观”“神本观”“传统人本观”“理性人本观”“激进人本观”“悲观人本观”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感知体验+人本认知”为立足点的“体验人本观”,简称“体认”(王寅, 2023: 10)。体验人本观对于认知符号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修正,认为应根据符号的象似理据和体验认知打破原有的符号形义一元观。为开拓“体认”在符号学领域的适切性,王铭玉和康喆文(2021: 1-8)从符号经典三分法原理出发,深入阐释了符号的意指过程(符码)、隐喻思维(符喻)、符号间性

(符间)、符号化过程(符化)、符号域(符域)等无一不伴随着主体的体验与认知,且尝试提出对“体认符号学”的建立。为突破西方传统意义上将符号实体与形式对立起来的狭义符号观,王铭玉和孟华(2021: 70-85)倡议发展符号学研究的第三条路径——“语象合治”。其中,“语”代表语符号,包括各类语言文字、标记等;“象”代表象符号,包括图象、行为举止等各类视觉和听觉符号,“合治”即语符号与象符号之间内部隐含、外部关联的跨界与相互补充。不难发现,语象合治倡导的“大符号观”“合治符号观”与“注重意指方式”恰好与符号具身认知所呼吁的扩大符号范畴、厘清符号系统内部关系、揭示符号系统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观点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可以大胆作出假设,体认中性符号学有其存在的理据,且语符号和象符号均与符号使用主体的体验和认知密不可分。

2 中性符号学的“体认性”

现代英国哲学家克拉克(Clark, 2016: 46)提出了“具身认知的预测加工模型”,叶浩生等(2022: 68-69)将这一模型归纳为三个层级:大脑层,强调生物体运作的生理条件;身体层,侧重身体与行动的紧密联系,着重身体通过行动体验和感知;环境层,即心智积极地建构其所揭示的世界,与环境互动并且相互影响。预测加工模型将认知的生理基础大脑、身体与周围环境联系起来,强调个体的体验对于认识客观世界和构建意义生成世界的影响,为深入探究符号的体认性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结合体认与符号学的发展演变,立足于中性符号的**本体-广义符号、主体-感知意象、客体-生活世界,我们尝试从中性符号产生的生理条件-认知生态位、物理条件-空间区域位、社会关系-社会建构位和文化模式-文化叙事位四个方面论证中性符号学的“体认性”。

2.1 认知生态位

符号学中的“认知生态位”(cognitive niches)源于生态学中的“niche”一词,指有机体在其社群中的角色和位置,通常用来讨论物种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韩蕾, 2017: 307)。生态符号学家认为,人类大脑通过所谓的“符号大脑”(semiotic brains)组成了一系列符号,通过显化和制造符号持续不断地将认知功能委派和分配给环境,参与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以减少对外界的认知局限(Magnani, 2021: 42)。这里的“符号大脑”实际上就是在强调符号的意识活动,人们正是通过这些符号将思想延伸到外部世界,促使“符号大脑”得到丰富和加强,进而支持主体使用符号与外界进行更高层次的互动,例如判断、推理、决策等。此外,认知生态研究还表明,承载着认知表征和符号意义的物质实体影响着认知衍生的过程,认知还被分布在道具(props)、工具(tools)、外在表象(external representations)、古器物(artifacts)等事物上,这些物质实体与认知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力量(Magnani, 2021: 45)。神经科学将这种现象称为“认知符号代理”(cognitive-semiotic agency),即符号与实体建立因果关系,经过第一人称(直觉)、第二人称(社会互动)、第三人称(脱离观察,如实验

等)三个不同层次的感知、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来考察符号化过程(Mendoza-Collazos, 2022: 149)。

从语象合治的理论基础看,中国传统思想理论基础中的“用可视、可感、有理据的‘象’去表达言与意,用可思、可说、可读的‘言’去建构和理解视觉的象”,和当代西方思想理论基础的“以物象的方式把握概念,以意义的方式把握物象”(王铭玉等, 2021: 75),其中的“象”与“言”均蕴含着认知的逻辑。从认知生态位中我们可以窥探出语符号和象符号的几点特殊性质:第一,多模态性。在认知计算领域,将人类利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认知世界交融形成的统一多感觉体验称为“多模态”(multi-modal)或“联觉”(synaesthesia),联觉能够使多种感官刺激的联合作用产生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李学龙, 2023: 2)。语象合治代表中性符号的表达单位具有语象相互跨界的双重编码性质,是一种“超符号”现象,即视觉、听觉、触觉与意义的内部隐含和外部关联。例如带有情感语音合成的文本,以声情并茂的表现方式被广泛应用于社交网络中,就是一种联觉的超符号体。中性符号的多模态性能够融合神经网络、注意力等进行情感分析、语义分析、事件分析等实证,从而提高中性符号理论的科学性与实用的广泛性。

第二,指示性。指示性是符号携带的重要特征之一,简而言之,就是符号与对象的指示性关联。皮尔斯曾提出对指示符的界定,指示符能够指称它的对象不是因为与其相似,而是因为与对象存在着动力学上、空间上或者感知上的联系。赵毅衡(2017: 112)认为因为指示符代表着符号最基本、最原初的意义关系,因此指示性才是符号的第一性。彭佳等(2017: 114-124)提出指示符具有具身符号感知性,动物和人类的先验意识是以指示性为框架和主导的。赵星植指出(2022: 74),指示符是唯一与语境相连接的符号。在语言符号学领域,指示性也是研究语言形式与社会意义的手段之一,语言符号通过索引过程使得语言形式获得意义,例如,语言意识形态、性别索引、秩序索引、立场索引等,能够系统地帮助我们了解语言符号的社会意义(Найман, 2021: 87)。然而,先前对于符号指示性的研究基本是站在符号形式与实体对立的立场,将符号与对象的指示关联拘泥于现实内容或直观形象。实际上,形式与实体相结合的中性符号承载着更为强烈的指示意味,体现着生命体对符号活动的影响。例如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月”,是古人根据月亮的形状描绘而来;又如“日”字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模仿的是人们直视太阳时候的状态。这里的“日”和“月”即同时兼具语符(声符)和象符(形符)两种功能,成为古时候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媒介。

第三,参与世界的建构性。生态学的研究表明,生物并不完全依赖于各自的周围环境,而是通过制造物种特有的生物现实,富有成效地参与世界的构建。“认知生态位的构建应被视为继自然选择之后,生物进化过程中的第二个主要参与者,因为它将反馈引入了进化动态中。”(Odling-Smee et al., 2003: 2)这里的“反馈”指的就是生物体通过改变环境并部分控制其生态系统,引起附近自然环境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与生物体大脑中的认知生态位

不可分割。中性符号异质多元的符号综合体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更为宽广的视野。叶舒宪(2001: 37)曾指出:“我们人类由于有符号能力,受观念支配,生活在符号所构建的现实中。我们所谓的现实,并非客观存在的现实,而是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由符号建构提出的。”例如,我国传统的易学、名学、训诂学、术数等符号资源,西方的神话故事、拉丁字母、雕刻绘画等,均是民族群体对自然界叙事的产物,共同的符号规约使群体凝聚成强大的集体力量,形成对于周围世界的普遍认识。又如,我国地域的各色建筑,北京的四合院、新疆的阿以旺、青藏高原的羌族碉楼、云贵高原的竹楼等,也是各类符号参与世界建构的产物。

2.2 空间区域位

符号的表征往往被视为由作为主体的人对客体或自然认知的意义呈现。人们通过符号表征感知世界、改造世界,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在空间中生产进行的。空间生产能够提供巨大的、无形的物质载体,使符号使用者、符号与周围世界开展形式各类的互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提出了空间生产,即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间三个概念。“空间实践”指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强调物质性感知空间;“空间的表征”偏向于一个语言性的符号系统,是社会主导性的概念化空间;“表征性空间”偏向于一个非语言性的系统,强调将物质性感知空间结合想象空间的生产(路程, 2015: 51-53)。我们可以看出,“空间实践”侧重于对物质性空间的感知,“空间的表征”侧重于对概念性空间的认知,“表征性空间”侧重于对想象性空间的预知,而符号表征正是在意义的空间生产中不断演变的。

提到空间我们不得不提及空间的丈量尺标——“尺度”。“尺度”原本是人文地理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一种对不同范围的地理过程和不同维度的地理属性进行划分、组合和再现形成的等级化的结构或关系(王丰龙等, 2015: 14)。尺度分析的空间矩阵按照地方、网络和领土的坐标,从下至上依次分为社区、地方、城市、区域、国家、全球等。这些空间尺度中无一不涉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每一类尺度实则都是“体验化的空间序列”,尺度的背后也必然隐藏着各种社会过程及权力关系网络。尺度的构建需要符号作为媒介。物质符号,加之符号操纵者的感知、认知和预知在不同空间尺度建构的过程中逐渐固化、达成共识和约定俗成,成为空间层级和区域划分的重要工具,例如社区规约、民族风俗、地方认同、国家制度等。从尺度的角度来审视符号,折射出符号的空间区域性特征。就语符号和象符号来看,语符号与象符号对于客观世界的表征略有差异,这种差异的浅层体现在符号的编码上,深层则受到符号空间区域特征的影响。象符倾向于象似或相似理据性编码,强调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自然关联和距离感的缩小,体现了东方符号学的理据性表征;语符倾向于任意性规约编码,强调意指关系的自由关联和间距性的扩大,体现了西方符号学的去理据性表征。语符号和象符号并不是孤立的,语象合治的中性符号消解了两端的极性对立,把广义的符号组合体纳入到不同尺度空间的聚合体中,促进了全球空间各类异质符号的交流和对话。根据基本地理空间维度的二次抽象,这里尝试将中性符号的空间区域表现形式划分

为地域性和地缘性。

其一,中性符号的地域性。地域通常指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体空间。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符号主体受周围地理位置、气候、土壤、水源、生物等因素的影响,在不断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通过创造符号改变物质空间,形成带有主体活动痕迹的景观。不同的地域均有其独特的代表性符号,反过来,典型的符号又能够让人们自然地联想起对应的地域。以语言符号为例,方言实为“地方语言”,是语言符号地域性的典型体现。中性符号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如在我国的音韵符号资源中,南方民歌多唱响在梯田、溪流、池塘等地,以委婉细腻的小调居多;北方民歌多唱响在山川、河流、草原等地,以高亢嘹亮的唱腔居多。又如,建筑符号,西方的哥特式建筑往往给人留下扑朔迷离、哀婉崇高的印象,而东方的四合院则体现出中轴对称、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二,中性符号的地缘性。地缘即地理位置上存在的某些有利条件。在地缘关系中,情感意识、具身体验与多尺度的地理环境相关联。符号主体的心理与行为机制受到特定地缘与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地缘的临近性能够加强主体间的身份认同和情感流动。异质符号系统因地缘情感联系与周围环境“邂逅”、通过具身体验完成意识表征和意指活动,从而形成地缘符号聚合体。例如,我国粤港澳大湾区的共同文化符号龙舟、醒狮、武术、粤剧及粤菜等,成为营造集体情感氛围、维系地缘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又如,源于中亚地区的胡旋舞,服饰、舞姿、配乐等视觉、听觉、触觉符号融合在一起,呈现出异质多元的、能够代表中亚地缘文化的民族符号综合体。

2.3 社会建构位

心理学家皮亚杰是较早提出心智“建构”观点的科学家,是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发展的奠基人。他认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心智的作用之间存在相互关联,这种关联包括认知主体的顺从、同化、内化和适应等心理机制,由此将个体、心理与社会联系在一起(郭荣茂,2023:1-2)。社会建构主义或建构学的应用认为,个人认知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与他人进行意义分享,从而创建社会网络,表达社会行为。从符号本身的属性看,符号具有社会属性,它是人类彼此之间的一种认识,只有当它为社会所共有时,它才能代表其他事物。具体来讲,符号在个人或集体的社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角色。符号主体通过符号的刺激与传递,一方面逐渐排除认知受限的符号,不断更新自身的符号系统;另一方面在不同符号的碰撞中寻求共振,完成与其他社会者的互动。借助各类异质符号,符号主体有能力将社会环境作为其认知内部世界的一部分来整合,并反向影响社会环境,同时建立不同的社会纽带关系。考虑到社会建构的基本主张及符号在社会建构过程中发生的作用,这里将中性符号的社会建构位分为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第一,中性符号对于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性符号的语符号和象符号在跨界的同时保留着语象差异的张力感或是混成一体的整体感,这种合治之路的背后实则受到符号使用者意识形态的操控。中性符号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将语符的任意性

逐渐放大,被赋予空前的公共意识力量或政治形态,其意指功能在新兴话语或权力话语中得到扩张。例如,在城市的物质空间符号系统中,物质生活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因此城市文化创意街区融合历史内涵和奇思妙想,成为集聚灯光、摄影、建筑、图象、公共标识等为一体的城市“新地标”符号。除此之外,中性符号的意识形态还反映着一种价值观念。当中性符号成为某种价值观承载的实体,它便具有了象征意义。也有学者对符号价值持怀疑态度,认为符号是虚幻的或者无关紧要的。事实上,人们需要符号向他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和立场,符号的价值反过来也能够增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结绳记事的传统,《周易·系辞》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目契。”(金景芳,1998:182-183)东汉郑玄在《周易注》中道:“结绳为记,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王弼,2011:275)可见,在远古的华夏土地,“结”被先民们赋予了“契”和“约”的法律表意功能,同时还有记载历史事件的作用。在我国的传统价值观中,“结”也是情感的象征,如“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腰间双绮带,梦为同心结”“绣带合欢结,锦衣连理文”等,均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体现。

第二,中性符号对于话语和身份的建构。符号思维与意象性原则的融合使中性符号更加注重意指方式,符号主体通过深入挖掘符号的意象空间来丰富符号的意义,对符号的解释角度和叙事风格做出适当选择,并有效使用符号物化形式塑造个体或群体的话语和身份。中性异质符号作为实体媒介,通过符号概念与物理实在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完成解码和编码的身份构建。个体使用他们作为个人或集体成员的标志向他人传达身份,通常会采用多种符号形式进行“自我象征”,例如着装、发饰、行为、特定的语言等。博物馆通常收藏着不同历史时期某些群体或聚落的遗迹,这些符号组合系统能够促进不同的话语传递和身份认同。以民族群体为例,作为一种符号“想象”的建构,民族认同通常被描述为集体认同形式,这种认同依赖于群体共同的历史记忆。博物馆借助不同的符号展示集体记忆,为参观者提供体验过去的机会,以此来促进民族认同,因此博物馆参观也成为人们了解自身发展的一种方式。

2.4 文化叙事位

学者们对于文化叙事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文学文本层面,先前研究往往停留在“物”的符号性上,割裂了“物”与“物外”的多重互动关系(陈斌峰,2021:1-2)。随着新物质主义的兴起,文化叙事早已突破了文学领域的重围,媒介传播、旅游管理、文艺学、美学等都开始探讨物质符号形态背后的多维度意义,对于“物”的研究正在成为显学。“物”往往被视为意象、符号,表征着社会历史和文化。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解释“物”,即包含着语符号和象符号的异质多元符号综合体。符号综合体的叙事网络不仅涉及符号,还包括符号使用者、指涉对象、场景、社会形态等多个交际因素,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使得符号的叙事突破“物”和“意”本身,突出符号主体的“动机理据”,在符号的理据性、约定性、意象性“合治”后兼具

叙事动力,促进文化叙事的实现。根据符号系统内部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外部的关联,这里将文化叙事位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中性符号系统内部的文化叙事。在西方文化符号中,西方的语象合治符号常常以语象跨界的差异感为主,突出语符号和象符号的对立面;东方文化符号则保持了语符和象符的相似感,突出语符和象符融合的一面。正如王安等(2019: 4-5)在《语象叙事研究》中所说:“语象二分而非融合……凸显了西方语象叙事传统与中国文论的最大不同。与西方相比,图文关系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处于水乳交融的状态,两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要缓和得多。纵观中国文学史,诗画同源、诗书画一体等概念基本占据主导地位。”西方文化多围绕语本文,以视觉表征语言符号,运用隐喻、蒙太奇、拼贴等叙事方式来实现视觉造型艺术的效果,这与东方文化的叙事方式截然不同。例如,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理论、俄罗斯符号学家巴赫金提出的对话理论,均是在文本中利用不同时间和空间交融的符号产生叙事形成的全景式体验。其二,中性符号系统外部的文化叙事。跨文化叙事是文化叙事的重要表现样态,主要指以跨文化传播为目的的文化叙事。在后现代社会文化向图象转向的背景下,跨文化叙事的方式更加多样,以视觉、图说为一体的多模态传播符号与情景相适配,尝试通过场景体验实现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尽管西方和东方的语象叙事传统有较大差异,但建立对话性的互鉴关系是符号系统外部文化交流、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费孝通先生曾讲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指的就是尊重文化符号的多样性,促进文化的交融和繁荣。

3 结语

中性符号学的“体认性”包含着以下观点:中性符号具有多模态性和指示性,能够积极参与符号主体对于外部世界的构建;中性符号的意指过程离不开空间生产,受到空间区域尺度的影响,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和地缘性特征;中性符号作为媒介在社会网络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载着群体和个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促使符号主体形成权力话语和身份认同;中性符号的异质性能够支持符号主体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进行多重叙事,形成多元对话,促进文化交流。

如果说中性符号学的“合治”思想旨在探明符号系统内部“语符”和“象符”的关联关系,那么体认中性符号学则在此基础上尝试厘清符号系统与人、客观世界的互动关系。有鉴于此,呼唤中性体认符号学的繁荣发展,探索符号学的科学现象与原理,揭示符号学的元学科性、多学科性、跨学科性,符合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及“符号世界”的发展规律,同时也是我们锲而不舍的理想与追求。

参考文献:

Azcárate, ALV. 2022. Cognitive Semiotics and Posthumanism[J]. *Designs* (35):229-245.

- Clark, A. 2016. *Surfing Uncertainty: 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Найман Евгений Артурович. 2021. Семиотические механизм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в языке [J]. *Вестн. Том. гос. ун-та. Философия. Социологи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59): 87-100.
- Klinkenberg JM. 2014. Cognitive Semiotics [J]. *Filozofia* (1): 22-32.
- LiYouzheng. 2012. Nonwestern Semiotics and Its Possible Impact on the Composition of Semiotics Theory in the Future [J]. *Semiotica* (187): 229-237.
- Magnani L. 2021. Semiotic Brains Build Cognitive Niches [J]. *Biosemitotics* (1): 41-48.
- Mendoza-Collazos J, Zlatev J. 2022. A Cognitive-Semiotic Approach to Agency: Assessing Ideas from Cognitive Science and Neuroscience [J]. *Biosemitotics* (1): 141-170.
- Odling-Smee F. J., Laland K. N., Feldman M. W. 2003. *Niche Construction. The Neglected Process in Evolution*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elkey, Jamin. 2023. Embodiment and Language [J]. *WIREs Cognitive Science* (5): 1-22.
- 陈斌峰. 2021. “物”: 文化叙事与话语意义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11-01 (008).
- 郭荣茂. 2023. 社会建构主义开启理解科学新视角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10 (006).
- 韩蕾. 2016. “Niche”概念的符号学解读 [J]. 中外文化与文论 (4): 307-316.
- 胡壮麟. 2013. 我国认知符号学研究的发展 [J]. 当代外语研究 (2): 6-10.
- 金景芳. 1998. 《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 [M]. 沈阳: 辽海出版.
- 李学龙. 2023. 多模态认知计算 [J].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1): 1-32.
- 路程. 2015.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研究 [D]. 复旦大学.
- 彭佳, 刘玲. 2017. 论先验意识的指示性框架及作为第二性的指示性: 兼与赵毅衡商榷 [J].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6): 1114-124.
- 王安, 罗悻, 程锡麟. 2019. 语象叙事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王弼. 2011. 周易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 王丰龙, 刘云刚. 2015. 尺度概念的演化与尺度的本质: 基于二次抽象的尺度认识论 [J]. 人文地理 (1): 9-15.
- 王铭玉, 康喆文. 2021. 后现代体验人本视域下的符号体认观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 1-8.
- 王铭玉, 孟华. 2021. 中国符号学发展的语象合治之路 [J]. 当代修辞学 (4): 70-85.
- 王寅. 2023. 体认语言学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 [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 7-17.
- 叶舒宪. 2001. 现代性与原始性: 符号如何建构现实 [J]. 民族艺术 (4): 37-39.
- 赵星植. 2022. 指示性与符号人类学的新发展 [J]. 符号与传媒 (2): 71-85.
- 赵毅衡. 2017. 指示性是符号的第一性 [J].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6): 104-113.

Embodied Neutral Semiotics: Based on the Intersection of Embodied Semiotics and Neutral Semiotics

WANG Mingyu KANG Zhewen

Abstract: Neutral semiotics exalts the concept of the big sign, dissolves the dichotomy between the language sign and the image sign, and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the universal phenomenon of semiotics. The broad sense of symbols and subject perception, meaning, and the world of life are intertwined, creating a deep correlation between symbols and cognition. Drawing on the view of postmodern embodied humanism, this study attempts to propose a “four-in-one” framework of embodied neutral semiotics, which explains the embodie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gnitive ecology, spatial region,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narra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on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eutral symbols in depth, and to improve the theory of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and imag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emiotics and cognitive science from a broad perspective, and to expand the semiotics model of East-West dialogue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ces.

Key words: embodied-cognitive; neutrality; semiotics;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and image; cross-cutting studies

责任编辑: 蒋勇军